



五年規劃是香港發展的「導航儀」



觀香港

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落下帷幕，會議高票通過了「十五五」規劃綱要，這為國家未來的發展謀劃了詳細的藍圖。與此同時，香港特區也將制定首份五年發展規劃。但是筆者了解到，香港社會對「五年規劃」這一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迷思與疑慮。為何作為自由市場經濟典範的香港，需要引入帶有宏觀調控色彩的五年規劃？在「一國兩制」的新形勢下，行政主導體制將如何保障這一規劃的有效落地？對於廣大普通市民而言，這份規劃又將意味着怎樣的機遇？釐清這三個核心問題，對於我們理解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徑至關重要。

一、破除迷思：規劃並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專利」，自由市場亦需「導航」
長期以來，香港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因此，當「五年規劃」這概念被提上議程時，社會難免出現疑慮，有人擔憂這是否意味着香港將放棄自由市場原則。這種觀念的誤區在於將「規劃」與「僵化」、「計劃經濟」畫上了等號，卻忽視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規劃」所扮演的戰略引導角色。

事實上，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並非社

會主義國家的獨創，更非計劃經濟的代名詞，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政策方法。放眼全球，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都在通過不同形式的規劃來引導經濟社會發展。

例如，二戰後法國為了快速重建經濟，實施了長達數十年的指導性計劃。法國的計劃是通過政府與企業、工會之間的協商，確定國家的戰略優先領域，並利用稅收優惠、補貼等信貸手段引導私人資本流向。這種模式被稱為「法蘭西模式」，它在戰後法國的經濟復興與「輝煌三十年」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再看近鄰韓國，其經濟騰飛史更是一部「五年規劃史」。從196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韓國政府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通過強有力的產業政策規劃，集中資源扶持鋼鐵、造船、電子等戰略產業。這種「政府主導、市場驅動」的模式，成就了「漢江奇跡」，造就了三星、現代等世界級企業。

由此可見，法國和韓國的經驗有力地證明了：規劃與市場經濟並不對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規劃可以彌補市場失靈，解決市場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和長遠發展問題。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是要為自由市場裝上「導航儀」，在保持市場活力的同時，通過頂層設計解決土地房屋、產業單一、貧富差距等頑疾，這正是成熟

經濟體的理性選擇。

二、核心保障：行政主導是規劃落地的關鍵引擎

如果說五年規劃描繪了香港未來的宏偉藍圖，那麼「行政主導」體制則是將藍圖變為現實的關鍵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行政主導極其重要，這是新形勢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依法治理、良政善治提出的新要求、新課題。他強調，行政主導不僅是行政長官、特區政府的事情，也是立法會、司法、全香港各個階層、派別的共同責任和任務。這一論述，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實施提供重要指引。

首先，行政主導確保了規劃的「頂層設計」與「統一意志」。制定五年規劃需要跨部門、跨領域的協調。在行政主導體制下，行政長官可以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確保規劃制定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香港長遠發展需要，避免了因政治內耗導致的政策搖擺。特別是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期，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主導架構來推行變革，打破既得利益的阻礙，確保五年規劃中的各項改革措施能夠「落地有聲」。

其次，規劃的實施不能僅靠政府一家

「單打獨鬥」。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下，立法會應當發揮「配合與監督」的作用，通過高效審議相關法案和撥款，為規劃實施提供法律和財政支撐；社會各界、各階層派別更應在行政主導的引領下，形成「共同謀發展」的社會共識。

只有確立了強有力的行政主導，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才能避免淪為「紙上談兵」的願景清單。它需要政府有魄力去推動土地改革、有決心去投入科研研發、有勇氣去調整利益格局。五年規劃是香港行政主導體制效能的試金石，是實現良政善治的必由之路。

三、民生機遇：市民的未來

五年規劃與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不僅是政府的發展大綱，更是市民尋找個人機遇、實現向上流動的「藏寶圖」。規劃所指引的方向，就是社會資源集中的方向，也是個人事業發展的風口所在。

例如，發展新質生產力將為科研與技術人才開闢新賽道。規劃必將強調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這意味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等領域將獲得政策傾斜與資金支援。又如北都建設將釋放巨大的發展紅利。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北都的開發將貫穿整個規劃期。這不僅意味

着建造業、城市規劃、測量等專業服務需求的井噴，更將帶動區內的零售、餐飲、物流等生活配套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對於基層勞動者和中產專業人士而言，這裏將提供數十萬計的職位。此外，五年規劃中對民生改善的承諾，如加快公屋建設、優化醫療體系等，也將直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正是五年規劃「以人民為中心」的最直觀體現。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制定，是香港破局突圍的主動作為。我們需要通過強化行政主導，確立規劃實施的制度保障；通過多領域的戰略布局，我們為市民描繪了充滿希望的未來圖景。

從國家層面看，這是香港融入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性安排；從香港自身看，這是邁向「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相結合」新階段的里程碑。筆者相信，只要香港社會上下同心，在行政主導的高效運作下，加快制定和落實推進五年規劃的落實，香港必將在解決當下的民生痛點的同時，更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佔先機，實現真正的良政善治，書寫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嶄新篇章。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祛魅日本：困在「發達國家」殼子裏的貧困兒童

看大勢

在全球輿論敘事中，日本常以「高度發達」「社會穩定」「民生優渥」的形象出現。然而，當我們撥開這層精緻面紗，一組冰冷數據揭示着這個國家鮮為人知的隱痛：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發布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該調查通常每5年公布一次），日本居民整體相對貧困率（低於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達15.4%，約2000萬日本人民處於貧困線以下。其中，兒童貧困率達11.5%，有近200萬18歲以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更令人震驚的是，單親家庭兒童貧困率高達44.5%，在經合組織（OECD）43個成員國中排名第八，遠超31.9%的組織平均值。

令人揪心的生存圖景
去年4月，一則「學校午餐只包含一小塊炸雞、一碗米飯和味噌湯」的報道引爆日本網絡，不少家長晒出自家孩子的午餐，表示孩子回家就喊餓，甚至「連監獄伙食都不如」。「兒童食堂」是日本民間為解決部分兒童吃不飽飯問題而自主發起的項目，然而隨着這一現象愈加嚴重，日本「兒童食堂」數量在2024年達到10800餘間，已超過公立初中的數量（9265所）。據日本兒童支援機構 Save the Children Japan 調查，九成受訪貧困家庭大米短缺，六成被迫減少主食攝入，四成兒童吃不到足夠的米飯。約三成兒童頻繁生病、變瘦、身高增長遲緩。近年日本物價飛升，5公斤的大米已從2000日圓上漲至4800日圓（約合人民幣240元），對日本的貧困兒童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難以掙脫的結構性困局
日本的兒童貧困問題，根源在於日本社會長期積聚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相互交織，形成難以掙脫的枷鎖，將數百萬兒童困在貧困的循環中。

宏觀經濟差。2025年日本2人以上家庭恩格爾系數為2.6%，創1981年以來新高。日資源匱乏、高度依賴進口，日圓貶值大幅提升進口成本，生活必需品價格急

劇上漲，2025年物價上漲3.7%，遠高於央行提出的2%目標，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物價上漲幅度，日家庭年收入和居民購買力持續下降，2025年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人均實際收入下降1.3%，連續4年下降且降幅擴大。

同工不同酬。統計數據顯示，單親媽媽收入普遍較低。是因為單親媽媽工作不努力嗎？當然不是。日本的薪資結構被概括為「10（男性正式員工）、8（女性正式員工）、6（男性非正式員工）、4（女性非正式員工）」。其根源在於日本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為刺激經濟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勞動者從身份、權利、待遇上劃分為「正式僱員」和「非正式僱員」，後者的薪資只有前者的六至七成，如今佔日本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單親媽媽困於育兒壓力等因素，多數只能選擇非正式工作，導致其收入微薄，這種僱用結構導致並固化了階層與性別的不平等，將單親媽媽排除在高收入人群之外，這是造成單親兒童貧困問題的經濟根源。

撫養費缺失。日本單親家庭率高達12.2%，其中母子家庭約為九成。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的調查，通過判決或協議獲得撫養費的母子家庭僅為44.3%，實際收到撫養費的母子家庭為28.1%。對比其他發達國家針對撫養費的保障政策（如可扣押工資、駕照，甚至採取監禁等刑事手段），日本針對撫養費的執行停留在民事上，執行力弱，這導致育兒的經濟重負幾乎完全壓在了單親母親身上。

再分配失效。日本老年人社保投入佔GDP 15%左右，而對兒童的投入僅佔GDP 1%-2%，在發達國家中處於極低水平。公立中小學表面免費，實際隱形教育費（餐費、補課費、課外活動費等）昂貴，大學學費高昂。兒童撫養津貼金額有限且獲取資格審查嚴格，而單親父母一旦再就業將面臨補貼中斷的風險，易掉入「貧困陷阱」。2025年單親貧困兒童補貼雖上調2.7%，但仍遠低於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速度。此外，日本獨有的「恥感文

化」強調「個人責任」，這導致兒童貧困問題被視為家庭應自行解決的問題，而非社會應共同承擔的責任，成為社保難以發揮作用的結構性障礙。

濾鏡破碎後的殘酷現實
真正的發展，不應只是GDP的增長，更是每個個體的幸福與尊嚴；真正的現代化，不僅是高樓大廈的林立，更是每個孩子眼中的光芒與希望。生存權和發展權才是最大的人權，當日本代表在人權理事會上高調宣稱「剝奪孩子的無限潛能絕對不可容許」時，約200萬日本兒童仍在被忽視的貧困泥濘中掙扎。日本兒童長期、大規模陷入貧困，成為日本最嚴峻的社會矛盾之一。這場沉默的危機不僅是數百萬兒童的生存困境，更是日本經濟停滯、社會結構固化的集中體現，它打破了外界對日本「全民中產」的美好想像，讓我們得以窺見這個發達國家精緻面紗下外強中乾的本質，是對其自我標榜的「文明」與「平等」的最有力祛魅。

國際問題評論員

香港「十五五」要實現四方面突破



思政策

維港的潮水，百年如一日地拍打着香港的海岸線，見證了一個國際大都會發展成功的傳奇，也見證了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光芒。站在「十五五」的開局起點上，香港不僅需要鞏固、更需要深化優勢；不僅需要融入、更需要引領突破。尤其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特別是與深圳的聯動中，香港需要一場從思維到模式的全方位革新，這將影響着這座城市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軌跡。

一、北都：從邊緣到中心的範式革命
香港的發展重心長期聚焦於港島與九龍，新界北區一度只能靜望着深圳從稻田蝶變為創新之都。如今，北都會區建設已成為香港發展與創新科技的起點。北都建設需要的是一場「企業主導、產業先行」的範式革命。不妨大膽設想：由政府與深圳乃至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同規劃，引入先進的園區運營理念，直接邀請或聯合龍頭企業主導特定片區的整體開發與運營。

更為突破性的構想是：將部分政府核心功能遷移至北都，不僅能在物理空間上象徵香港發展重心的戰略調整，更能實質性地帶動人口、資源與關注度向北流動。

二、超越地產金融：打造全方位的經濟流動引擎

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段時間都是以「金融+地產」雙輪驅動。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多樣性方能抵禦風險、生生不息。加強港深合作，正是香港培育經濟新物種、構建產業新生態的歷史性機遇。唯有培育「新模式」，經濟增長的成果才能浸潤至社會的各個階層。這種流動，才是可持續、可共享的發展真義，也是香港為國家所能做出的獨特貢獻。

三、文化鑄魂：在中外交匯處深化中華根脈
當人工智能重塑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教育的本質更需回歸對「人之為人」的價值的堅守。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在「十五五」時期，香港應展示文化自信，將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機能，從「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轉向「深化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引領中華優秀文化走向世界」。

其中，中醫是極具象徵意義的抓手。香港可匯

聚內地頂尖資源，建立集教育、科研、臨床、標準制定於一體的「國際中醫中心」，使之成為中華生命智慧走向世界的「大門」。如此，香港的文化定位將從「展示窗口」升級為「創造引擎」與「輻射樞紐」，在為民族復興貢獻軟實力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四、科技破局：引強聚鏈，構建區域創新極
香港的創科發展，雖有意氣相投的規劃與投入，卻缺乏具有全球號召力的科技巨頭壓陣，難以形成強大的產業鏈拉動效應。破解之道，在於極具魄力的「引強聚鏈」戰略。香港應充分利用其獨特的地位與自由開放的環境，設計極具吸引力的政策包，定向吸引海內外的優秀科技企業來港設立區域總部、研發中心或融資平台。更主動與深圳的產業規劃對接，尤其是在河套等跨境合作區，探索「深圳管理、香港規則」或「共同管理、共享成果」的新機制，讓創科要素真正暢通無阻。同時瞄準鄰近國家的隱形冠軍或大型企業，針對其開拓中國及東南亞市場的需求，提供「香港基地+內地市場+國際網絡」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吸引它們將研發或運營總部設在香港。透過引入不同企業，從根本上改變香港創科「有院無產」的格局。

「十五五」時期的香港，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是繼續在原有的雙輪路徑上慣性滑行，還是切換軌道，在服務國家所需中重塑自身所長？答案清晰而迫切。

深化大灣區融合，是香港突破發展瓶頸、再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途。這需要一場從空間布局、經濟結構到文化認同、創新體系的系統性革新。將北都打造成創科主導的發展新重心，在全方位的經濟流動中培育新動能，在中華文化的深植與傳播中築牢價值根基，在吸引全球科技強企中構建產業生態——這四重奏，正是香港在「十五五」時期譜寫的新樂章。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策略，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再造，旨在讓香港更加繁榮與可持續發展。

當香港成為推動國家與世界深度融合、引領大灣區未來形態的香港時，「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便將煥發出超越時代的光彩。維多利亞港的潮水，終將載着這座煥然一新的城市，奔向一片更為壯闊的融合之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多元教學模式 助學生學習古典文學



思教育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為推動教師採用更多元的教學模式，以提升教學效能與學生的學習體驗，特別設計了「藝文共韻」系列教材短片。教材選取五篇經典，承蒙教育局邀約，我有幸參與拍攝，負責前兩集的文本分析與吟誦演繹；後兩輯則由劉衛林教授擔綱。

這是一次難得的機緣，讓我得以將多年來對古典文學的研究與吟誦的體會，透過鏡頭與學子分享。拍攝雖已結束，然箇中感悟，縈繞心間，願與讀者諸君分享。

一、從「藝文共韻」看文學教育的突破

「藝文共韻」四字，說出製作教材的精髓——「藝」與「文」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傳統文學教學多側重文本解讀、背景介紹與修辭分析，雖屬必要，卻容易令學生感到隔閡。文學本是鮮活的藝術結晶，若止步於文字解讀，效果終難發揮盡致，減低觸動心靈的效果。

此系列教材的構思，旨在突破上述藩籬——以多元藝術形式展示文學作品，讓學生在欣賞書法、古琴、戲劇、朗誦的同時，自然而然地走進文學的世界。此種跨領域的教學模式，既能激發學習興趣，亦可提升學生的文化與藝術鑒賞力。構思可謂用心良苦，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二、吟誦——通往古典文學的鑰匙

在這次拍攝，我以吟誦的方式演繹作品，並介紹吟誦的特點與方法。吟誦，是中國傳統的讀書法，古人所謂「讀書聲出金石」，正是吟誦的生動寫照。可惜的是，這項傳承千年的文化瑰寶，在現代教育中日漸式微，許多學生甚至未曾聽聞。

吟誦之妙，在於它能將文字的意義、情感與音韻之美融為一體。以《念奴嬌》為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句，若只作文字解讀，學生或許能理解其豪邁氣勢，卻難以體會蘇軾筆下的蒼茫與悲壯。但當我們以吟誦的方式，將「江」字拉長，似見長江滾滾東流；將「盡」字頓挫，彷彿感嘆英雄已逝——此種聲情並茂的演繹，能讓學生瞬間穿越千年，與蘇軾的心靈共鳴，同歌同哭。

又如《前赤壁賦》中「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一句，吟誦時語調轉為低沉緩慢，可從聲

韻中感受人生短暫的無奈與宇宙浩瀚的震撼。而《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需以堅定沉實的語調吟出，方能傳達范仲淹心繫天下的襟懷。此類情感，若僅憑文字講解，學生未必能深刻體會；但透過吟誦，他們能「聽」見文字背後的聲情，從而真正「感」受作品的靈魂。

三、多元藝術的交融與碰撞
拍攝採取分場進行，後經剪接製成短片。我有機會觀看短片初稿並提出修改意見。整體而言，效果甚佳。書法家以筆墨再現蘇軾詞賦的豪邁放曠和范仲淹文章的仁者襟懷；古琴家演繹陶潛《歸去來辭》的恬淡自得；小學生化身粵劇演員，以唱做展現花木蘭的英姿；朗誦專家以聲線詮釋作品的節奏氣韻——這些藝術形式與吟誦相互呼應，共構一立體而生動的文學世界。

四、教育意義與文化傳承
「藝文共韻」的深意，不僅在於是一套教材，更是一種文化傳承的途徑。香港的學生身處中西文化交匯之地，既擁擁抱現代文明，亦須認識傳統文化的根脈。透過這樣的設計，他們能在藝術欣賞的過程潛移默化，吸收古典文學精華，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自豪。

作為參與者，我深感榮幸，亦勇責任重大。古典文學是我們的文化瑰寶，吟誦則是開啟寶庫的鑰匙。若能藉此次拍攝，讓更多學生認識吟誦、愛上吟誦，進而愛上古典文學，那將是此次工作最大的意義。

五、結語——古韻今彈，藝文共鳴

拍攝告竣，回顧起來，心中滿懷感恩。感謝教育局的悉心籌劃、製作團隊的專業投入、各位藝術家的精彩演繹，亦感謝古典文學為我們留下的永恆智慧。

蘇軾於《前赤壁賦》有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文學的韻味，正如這清風明月，須以心聆聽、以心觀照、以心感受。「藝文共韻」的嘗試，正是讓學子透過多元藝術的媒介，聽見文學之聲，看見文學之色，感受文學之美。願此套教材如春風化雨，滋潤學子心田，讓古典文學的種子在其中生根發芽，綻放新的光彩。

香港華夏教育機構副會長